



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



李明斌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从秦国中心的关中平原向南翻越秦岭, 穿过汉中盆地, 即达广袤、富庶的四川盆地。四川盆地, 群山环绕, 四面高大的山脉将盆地与周围地区分隔开来, 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单元。切开盆地北缘的嘉陵江将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连接了起来, 形成中国西部地区南北向一条重要的文化通道和文化走廊(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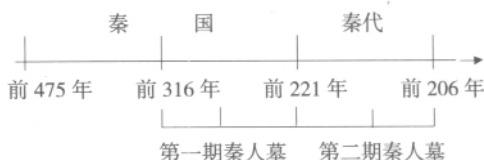
根据考古发现, 在四川盆地西部传统意义上的蜀文化分布区域内出土的多处秦文化墓葬, 它们的族属应是秦人墓。公元前 316 年, 秦举巴蜀, 巴蜀之地正式归入秦国版图, 时大约在战国中期。随后秦国即大量向蜀地移民。公元前 221 年, 秦统一山东六国后, 更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在四川盆地内数处驻军设防, 并留下秦人墓地。根据这一史实, 本文对四川盆地秦人墓先做一时间界定, 将四川秦人墓分成两

期:

第一期: 公元前 316 年——前 221 年, 秦国(战国中期以后)秦人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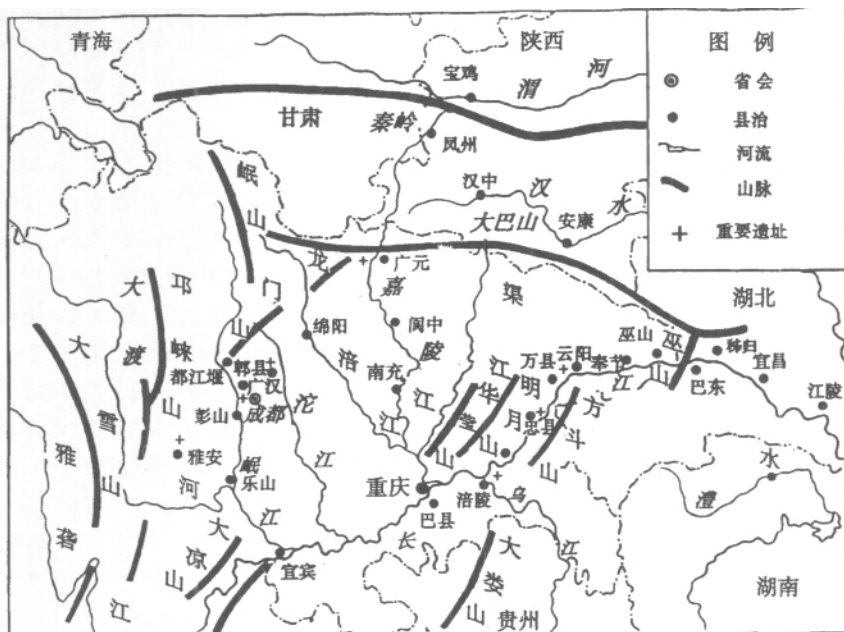
第二期: 公元前 221 年——前 206 年, 秦代秦人墓。

四川盆地秦人墓分期如下面的年代轴所示:



一. 四川盆地秦人墓葬分析

根据现有材料分析, 四川盆地秦人墓有 4 处, 它



图一 四川盆地的主要山脉及河流

(采自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3页图 1.1)

们主要发现在四川盆地西部地区的交通要冲沿线和城邑, 分别位于四川盆地的腹地地域成都市龙泉驿、盆地北缘青川县郝家坪和盆地西南缘经县曾家沟、古城坪。

我们知道, 关中秦墓的墓葬形制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洞室墓两大类, 葬式主要有直肢葬和屈肢葬两大类, 墓向可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大类。这对于判断四川盆地内非晚期巴蜀文化墓葬的性质具有可资参照的价值。由于时代和

认识的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考古界普遍认为洞室墓是战国时代关中秦墓的主要特点之一,但根据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认识对于上述观点已有所修正:关中地区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的秦墓均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这是关中秦墓自身固有的传统墓葬形制,关中地区洞室墓在战国中期晚段才开始出现,流向是由东向西。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也是关中秦墓的特点之一,而且楚墓中带二层台者远不如关中秦墓普遍。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秦墓中也是有头箱、边箱和足箱的设置。

墓室填塞白膏泥也曾一度认为是战国时代楚墓的主要特点,但白膏泥用于墓葬是起防潮之用,在这一功用前提下,将其定为发现时代较早的楚墓的主要特征,显然缺乏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在后来清理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山东栖霞西周墓、山西长子牛家坡战国7号、11号、12号墓、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中都有以白膏泥填塞椁、棺周围的现象,它只是作为墓葬的一种防潮措施,只要有这类膏泥存在,就可能会被当地的人们所利用,因而,不宜将其作为用以判断文化性质的标尺来对待,更不应拘泥于其中。那么,我们对这类墓葬文化性质的判定,最为重要的依据是对其中所出器物进行充分的分析,尤其是要注意它们的陶器组合情况,这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方面,陶器组合的性质决定着墓葬的性质。这也是我们分析、判断四川盆地秦人墓性质的主要依据。

关中秦墓以鼎、簋、壶仿铜陶礼器为组合,陶釜也是关中秦墓中典型的日用陶器之一。关中平原川地区秦墓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双耳釜,该地区在秦统一前还出现一种双耳罐,这种双耳器比较发达的现象,是关中平原古文化中所特有的。

下面依不同的时代对各个墓地进行分析,并总结出它们的特点。

(一) 秦国(战国中期以后)秦人墓

1. 青川郝家坪墓地

墓地位于白龙江下游,时代在战国中期和晚期。发掘简报没有将七十二座墓葬按个体予以交代,因而在文化内涵的有些方面无法细化,只能进行笼统性描述。

墓葬皆竖穴土坑墓,无墓道,有一部分墓有生土二层台。葬具有棺槨,可分一棺一槨、有棺无槨、有槨无棺几类。部分墓葬无葬具。棺槨外填塞白膏泥。

随葬陶器有鼎、豆、盒、壶、罐、双耳罐、盆、釜、蒜

头壶等,陶器组合有两种:鼎、豆、壶、鼎、盒、壶。铜器有鼎、镜、带钩、釜等;漆器有扁壶、双耳长盒、圆盒、奩、耳杯、圆壶、鸭嘴壶、匕、碗、卮等,有些漆器上有针刻的“成亨”、“王”、“东”等文字。青川郝家坪墓地的两种陶器组合在战国时代是包括秦、楚在内各地均流行的,但青川郝家坪没有楚墓中常见的鼎、簋、壶、鼎、敦、壶或鼎、簋、敦、壶组合形式,而具备关中秦墓组合中的鼎、壶要素,其显然具有秦墓陶器组合的内核。同时青川郝家坪陶釜是主要器类之一,陶双耳釜、双耳罐和蒜头壶更是关中秦墓所特有的代表性器类。根据对青川郝家坪所出铜器和漆器的分析,也得出了它们的文化属性是秦文化的结论。因此,我们认为将青川郝家坪墓地认定为秦人墓是合理的。

表一 从陶器判断青川郝家坪墓地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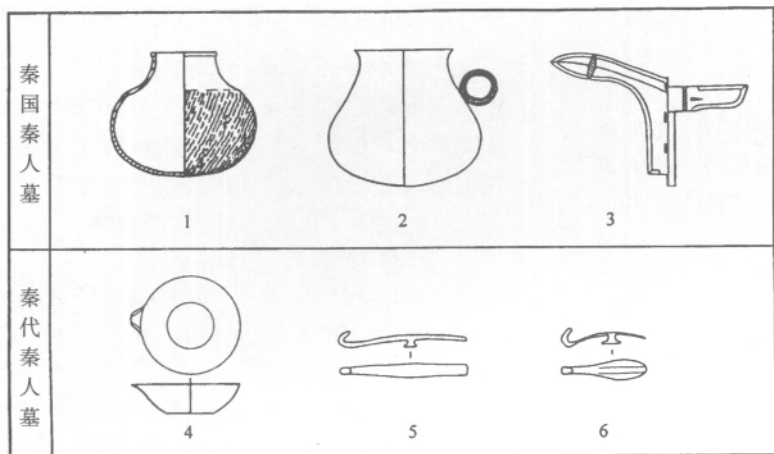
	陶器组合	陶瓷	陶双耳釜、 双耳罐	陶蒜 头壶
青川郝家坪	鼎、豆、壶、鼎、盒、 壶	✓	✓	✓
关中秦墓	鼎、簋、壶	✓	✓	✓
楚墓	鼎、簋、壶、鼎、敦、 壶、鼎、簋、敦、壶			

2. 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的12号、18号、19号和20号墓葬,为墓地的一部分,该墓地顺着坡势逐层分布、成组排列,简报公布的墓葬平面总图中没有打破现象,显系有一定的规划。上述四座墓葬两个一组,墓向东北,其中12号、18号墓位于墓地的中部、19号、20号墓位于墓地西南。

由于篇幅等原因,发掘简报未能全面公布简报所分每一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墓葬情况,又没附墓葬登记表,故而给归纳它们的特点带来了不便。检索简报全文,墓葬形制方面的报道仅涉及上述四座中的12号墓,而且12号墓只是作为统计意义出现的,并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供利用,因此我们只能更多地从归纳性的描述中复原它们的形制特征,但已不能完全反映它们的“历史的真实”,信息人为地被衰减。器物报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仅能根据简报公布的器物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墓葬形制。墓圻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口大底小。填土为五花土,一般经夯打,其下为白膏泥。葬式不明。12号墓,无槨无棺,墓底铺设木板,有熟土二层台。

随葬器物,数量较少。陶器盖(M12:7),喇叭形,



图二 成都龙泉驿秦文化墓葬器物举例

1.陶釜(M12: 8) 2.铜釜(M19: 4) 3.铜戈(M19: 3) 4.铜匣(M34: 24)
5.6.铜带钩(M24: 10; M34: 6)

斜直壁, 纽似假圈足。陶釜(M12: 8), 小口, 有肩, 鼓腹, 圜底。铜釜(M19: 4), 侈口, 束颈, 鼓腹下垂, 一辨索状环形耳。铜戈(M19: 3), 曲狭援, 长胡, 阑侧三穿, 刀形内上有三角形穿, 内端有刃。铜矛(M19: 2), 长窄叶, 长骸末端呈叉状, 上有一穿孔。铜印(M19: 10), 印面长方形, 侧视呈台体, 环形鼻纽。漆奁盖(M19: 16), 黑地红彩, 饰涡纹、带状纹。

另有一件陶甗存疑: 简报型式分析中 A 型甗器物号为 M19: 12(第 26 页), 但所附线图却标明是 M9: 12, 文图不一。根据该器物的形制, 以其为 9 号墓器物的可能性最大, 为西汉早期墓葬所出。

上面就是从简报中能了解到的相关墓葬的情况, 信息量明显过少。

20 号墓所出陶盆(M20: 2), 与陇县店子秦代 281 号墓之陶盂(M281: 1)形制相近,^⑩我们认为将其年代断在秦代更为合适。

由于出土或公布的陶器过少, 令人无法把握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秦人墓的组合特征,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主要从墓葬形制和铜器分析着手, 来论证其文化性质。

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三座墓(已将 20 号墓定为秦代秦人墓)的形制, 跟关中秦墓的形制特征多有符合, 如口大底小长方形竖穴、带二层台等。陶釜在关中秦墓中甚为常见, 是流行的炊器。铜釜虽源自巴蜀, 但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的关中平原也多有出土, 亦成为了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种同类器物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充任“组合”角色也是数见不鲜的, 如鼎之于秦、楚文化组合。铜戈与陇县店子

战国早期秦国墓之铜戈(M281: 1)形制相近^⑪, 均狭长援弯曲上扬, 长胡三穿。

就简报公布的材料来看, 上述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三座墓中, 秦文化占了主导地位, 其性质体现出明显的秦文化特征, 是秦文化墓葬, 属战国晚期的秦人墓(图二)。

3. 荣经曾家沟墓地

简报发表七座墓葬材料, 并将 11~16 号定为战国早期、21 号墓为战国中期^⑫。四川大学宋治民教授将它们的时代定在战国晚期^⑬。

这七座墓的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墓, 无墓道, 大多数留有熟土二层台。葬具有一棺一槨、仅有棺或仅有槨三类, 在葬具外填充白膏泥。这些都和青川郝家坪秦人墓的特征是一致的。曾家沟墓地个别墓葬头箱(16 号墓)和边箱(21 号墓)的设置也在关中秦墓中有发现。

随葬器物主要是漆器和陶器。漆器有扁壶、双耳长盒、圆盒、奁、耳杯等, 陶器有罐、釜两类。其漆器组合跟青川郝家坪秦人墓几乎完全相同。而以扁壶和双耳长盒为代表的漆器是只见于秦人墓中的。平底陶器是关中秦墓陶器的主要造型风格之一, 而陶釜虽源起于四川盆地, 但至战国时代, 陶釜已然为关中秦墓陶器组合中不可或缺的要件。罐、釜“搭配”随葬在战国秦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如长安客省庄、西安半坡、大荔北寨子和宝鸡李家崖等地。

从以上两方面分析, 将荣经曾家沟这七座墓葬的性质定为战国晚期的秦人墓是可以成立的。

根据宋治民先生对荣经古城坪墓地^⑭墓葬形制、所出陶器、铜器和漆器的分析, 该处也为一秦文化墓地。

(二) 秦代秦人墓

成都龙泉驿 24 号、31 号和 34 号墓葬, 墓向东北, 其中 24 号墓位于墓地北部, 31 号和 34 号墓为一组, 位于墓地南部。

墓葬形制。以 34 号墓为例, 长方形竖穴土坑, 墓口南边为不规则弧形(注: 简报图二的平面图跟图一墓葬分布图中的 34 号墓墓口南边形制相差甚远), 有槨无棺, 坑底横置枕木, 枕木四周填白膏泥, 其上铺底板, 置挡板、壁板和盖板。槨室内有一狭长形边

箱。其形制除表现为典型的秦墓特征外,坑底设枕木是楚文化因素^⑤,表明盆地内的秦人墓同样具有复杂的文化面貌(详见后文)。

随葬器物。陶瓮,小口,短颈,鼓腹,小平底。M34:19,器身瘦高。M34:11,器身略瘦。M24:21、M34:3,器身较矮胖。铜螭(M24:8),侈口,束颈,鼓腹下垂,两环形耳一大一小。铜釜(M34:4),侈口,鼓腹浅,两对称辫索环形耳。铜盘(M34:8),敞口,宽沿,折腹,平底,腹部有4个对称衔环。为典型的中原因素,形制相近器物在新都战国中期蜀文化大墓中有发现。铜匱(M34:24),敞口,浅腹,口沿一侧有一短流。与陇县店子秦代279号墓之同类器(M279:6)形制相近^⑥。出有半两钱。另有铜圆刃折腰钺(M34:7)、对称弓形耳矛(M24:9)、扁茎无格剑(M24:11)等兵器以及带钩、工具削等。钩体呈棒形的带钩(M24:10和M34:6)在陇县店子秦墓中也占了绝大多数。根据简报文、图,34号墓中还出土有陶釜、豆、漆盂、木器盖、木纺轮等物。简报公布出土遗物中,没有涉及31号墓,我们只能同意简报撰写者根据发掘时情况作出的判断,将其跟24号、34号墓一道视为秦代墓葬。

综合上面的分析,这几座墓葬中的秦文化因素较之蜀、楚文化明显占了多数,可以确定它们(含20号墓)属秦文化墓葬,是秦代秦人墓(图二)。

我们认为,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和秦代的这批墓葬是成都平原东部地区不可多得的秦文化墓葬材料,它们具有典型的秦墓的基本特征,也并非“典型的秦文化的遗物几乎不见”,同时,这批墓葬中还有蜀、楚等文化因素。对它们文化性质的重新甄别,对于进一步探索秦在四川盆地的统治策略、驻军布置、盆地土著文化的“异化”进程都是可资凭用的论据。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四川盆地秦人墓的特点:

1. 墓葬形制

长方形竖穴土坑,口大底小,部分墓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葬具分有棺有槨、仅有棺或仅有槨三类,木槨或木棺外填以膏泥。有的墓葬有头箱、边箱等设置。

2. 随葬器物

以漆器和陶器占多数,铜器少,兵器更少。漆器主要种类有扁釜、双耳长盒、圆盒、奩和耳杯等,陶器常见鼎、壶、平底罐、釜等,铜容器有鼎、螭、釜等类,兵器有戈和矛。

二.四川盆地秦人墓中其它文化因素透视

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战国时代的四川盆地除了以晚期巴蜀文化占主导地位外,还聚集着数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也就是说,移民墓存在异化的趋势,这一历史客观也在四川盆地秦人墓中得到了反映。同时,移民的组成存在多样化的可能。

(一)巴蜀文化因素

上述墓地虽为秦人墓葬,但它们存在于巴蜀文化的原生地,处在巴蜀文化的包围之中,其中出现巴蜀文化因素,应是理所当然。

巴蜀文化因素在秦人墓中主要体现为部分日用陶器和兵器类等种类单调的器物,如陶豆、釜、瓮、器盖和铜圆刃折腰钺、对称弓形耳矛和柳叶形剑等,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吸收较多外来因素的巴蜀文化墓葬中,日用器和兵器为巴蜀器物,其它如礼乐器、装饰品则仿制外来因素。此时的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多样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其与外界的交流、融合的规模都是空前的,那么,全面、具体分析出土陶器,以日用陶器的组合情况来判断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四川盆地面貌纷繁复杂的考古遗存的性质、族属应是我们坚持的一个首要和最主要的标准。恐也唯有如此,才能相对客观、准确地把握住四川盆地战国时代的文化特征,对四川盆地在中国战国时代进行接近“历史真实”的定位和深入的研究。

(二)楚文化因素

到战国中期以后,由于灭并巴蜀,秦文化之对于四川盆地而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楚文化。加之,楚、巴战争,使楚国长期胶着于盆地东部的峡江地区而停滞不前,始终没有完全控制住通往富庶川西的这一“瓶颈”,分析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楚国内乱,楚怀王后期,公元前279年前后,“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篇》)因此,楚国的力量就越来越衰弱了。二是经营了数百年的江汉平原优越的生存环境削弱了原本出自山林的楚人的进取心和攻击力。楚文化因素多由巴文化的转承才进入成都平原。

成都龙泉驿战国晚期19号秦人墓出土的铜矛(M19:2)为楚文化因素器物,其跟湖北当阳赵家湖战国早期楚墓的同类器(JM98:9)形制相近^⑦,而且龙泉驿该墓所出漆奩盖(M19:16)不像秦之彩绘纹样那样凝重、规矩、强调秩序,符合典型的楚文化彩绘飘逸、空灵、浪漫的传统。

楚文化之对于四川盆地战国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虽然较之北方的秦文化对四川盆地的影响更久(早在春秋末年的公元前477年,巴就曾伐楚,并围鄢,楚反攻得胜。楚肃王4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攻取兹方,楚筑扞关御。)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不但涉及日常生活用陶器,而且有些楚文化青铜礼器也为晚期巴、蜀文化所用^⑧),但不及秦文化随着统一战争来得更直接、更集中和更猛烈,其明显表现出军事强势文化具有的激烈但短促的特征,但它所产生的后果却是长久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战国时代四川盆地出现的楚文化因素,不是由楚移民带来的,而只不过是楚文化对四川盆地的影响所致。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接连攻克楚之郢、鄢、邓、蓝田等五城。按照秦国迁徙它处的人移民占领地的做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和江陵岳山^⑨等地都发现有秦人的移民墓地,但是没有足够的逻辑推断支持楚有移民至蜀的论点,因为在秦并巴蜀之前,蜀、楚之间为了抵抗北方强秦,曾联合对付秦军,或单独与秦交战^⑩,虽然蜀、楚先后为秦所灭,但它们对秦的敌对情绪犹在,反叛间起,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秦国当然既不会迁蜀人入楚,亦不会徙楚人入蜀,为两“宿敌”提供再次“联盟”对秦的机会,只能用秦文化异而化之,个中道理不言自喻。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以中原六国有被秦互迁移民的现象,就类推蜀、楚间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在战国时代的七大强国中,领土以楚为最大,兵额以楚为最多,武器以楚国铸造的最为锋利,楚国的资源也很丰富,山泽的出产很多,手工业生产也很发达,楚国是相当强大的国家,曾两次被推为纵长,主持合纵攻秦事宜。后来秦灭楚,用兵最多,遇到的阻力也大。战国晚期的纵横家常常以楚、秦相提并论,认为“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⑪。因此,秦对“纵长”楚国的占后统治当有别于其它各国。

四川盆地内没有发现楚人墓地,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楚文化对于四川盆地的影响是绵长、渐续式的,在考古上的反映就是在有的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有较多的楚文化器物出土,带有一定的楚文化色彩,甚至浸润到上层意识形态中(如采用楚式青铜礼器成为晚期蜀文化高等级墓葬中的常见)。正是这一持久的文化浸润,使楚文化因素在盆地内有普遍发现,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楚文化是四川盆地除晚期巴、蜀文化外,最为普遍和广泛的外来文化因素,加之开明氏(鳖灵)入蜀的记

载,更是加深了这一“先见”——战国时代的整个四川盆地都处在楚文化的包围、甚至异化之中。但历史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为转移,华丽、奢靡、飘逸浪漫的楚文化特质,在历史的选择中终究不敌简朴、实在、强调秩序的秦文化,因为后者顺应了历史潮流,数百年的纷争、割据局面,必然性地要走向它的反面,历史地形成了一种和平、统一的趋势,于是出现了秦的统一战争并取得成功。在四川盆地内,秦、楚这两种外来文化在经过短暂的相持后,以秦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系统迅速将盆地汉化化,在短短百余年时间(秦灭巴蜀至西汉武帝间)里,使为“戎狄之长”的四川盆地的文化变得与中原无二,秦人移民墓可视为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标志和起点,至此,四川盆地的古代文化在经过数千年的文化洗礼后,完全融入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华夏文化体系之中,并以其为自己的本位文化,与其它古代民族一道共同创造和谱写着华夏文化的新篇章。

三. 四川盆地秦人墓的性质、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作用

(一) 性质

如上所述,四川盆地秦人墓是从他地、迁徙他民族人群而形成的,因而应视其为移民墓。由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这些移民墓的主人由于迁徙的背景和目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一为“和平”牧歌式的迁徙;一为纯军事行动的驻军。

秦“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史记·张仪列传》);同时“以张若为蜀国守”,“移秦民万家实之”,因为“戎伯尚强”(《华阳国志·蜀志》)。根据史载,秦国在中原兼并战争中推行了两点政策:一是把那些被判罪的“罪人”赦免了,迁到新得的土地上去,以补充这些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如公元前286年秦在取得魏的安邑后,公元前282年秦在攻取得赵二城(蔺、祁)后,都曾“赦罪人迁之”;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攻楚,也“赦罪人迁之南阳”:公元前279年秦在攻取楚的郢、邓等城后,也“赦罪人迁之”;公元前273年,秦建立南阳郡,又使“免臣迁居之”(《史记·秦本纪》)。二是攻取某些大城之后,把城中的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⑫。这一驱逐旧贵族的举措,应当是秦国对占领地的一项惯常的强制措施,势必引来包括蜀国旧贵族的反抗,而反抗的极端形式就是起事,从而直接导致秦在蜀地驻军,这又关联到秦人墓出现的另一重要历史背景。

(二) 出现的历史背景

秦灭蜀后,先后于公元前314年、公元前308年和公元前300年封蜀王后裔公子通国(一作“通”、“繇通”)、公子燁及其子公孙綰为蜀侯^②,并皆以反叛罪名将他们杀死。这一历史的活剧,在公元前226年,韩的旧都新郑发生叛乱,是韩国旧贵族不甘心于灭亡而发动的一样,得到再次上演。秦随即平定叛乱,并将迁居在外的韩王安处死(云梦秦简《编年记》:“廿年韩王居口山”,“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口屈。”)。

蜀地的这种屡屡出现的反叛事件,必然要引起秦加强对这一“戎狄之长”的控制,以图大业一统。攻灭蜀国并稳固其统治,“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可以“利尽西海”(《战国策·秦策一》)。巴蜀可以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证明秦先后杀死三个蜀侯才巩固了对蜀的统治,根本的出发点是图谋天下。事实上,“蜀既属,秦益强富厚”(《史记·张仪列传》),为秦东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基于上述原因,秦人墓频频在蜀地发现,也是合乎情理之事了。

战国晚期秦人墓在四川盆地分布的地点和数量上明显广于、多于秦代秦人墓,前者在盆地的北部、西南部和成都平原都有发现,而后者仅在成都平原少量的发现,呈现出强烈的收缩态势,这应和两个时期四川盆地的局势是密切相关的。秦初并巴蜀,局面纷乱,反叛间起,秦国分别于川陕通道、南方丝路重镇及蜀国故都移民驻留,既可削弱东方六国豪强势力,又可镇摄全川,还可保障蜀之物产顺利运抵关中,及时补充战略物资及消耗。至一统六国,秦治蜀已历百年,秦先进的政治体制和生产力方式亦为蜀人所接受,统一趋势已势不可挡,秦在蜀国故都的战略要地移民定居具有的是更强的象征意义了。

(三) 作用

秦人墓在四川盆地所起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它的军事性质方面,即稳定了当时蜀国的局势,使秦国的大后方得以安定,安定而富庶的四川盆地又为秦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即所谓“蜀既属,秦益强富厚”,可以“利尽西海”。

四川盆地秦人移民墓还是四川盆地晚期巴、蜀文化汉化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标志和起点,它们带来的先进的中原文化起到了决定盆地文化走向的重要作用。秦向巴蜀移民的目的是尽快在这一新归秦国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推行秦的政治、经济制度,使

巴、蜀居民在生产、生活乃至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接受先进的秦文化影响,从而巩固其在巴蜀地区的统治。这一目的的实现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其预期的目的达到了,产生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巴蜀文化能较快融合于汉文化之中,这和秦人移入巴蜀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定居下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③。

四. 四川盆地内部分秦代墓 有关问题的分析

(一)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初探

此墓原报告定为战国墓^④,现根据出土器物定为秦代墓葬^⑤。但对它的文化性质及族属的判断,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墓中所出器物及历史背景的不同认识,却得出了不同的论点。我们认为,成都羊子山172号墓的性质是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较多的晚期蜀文化、蜀人墓葬。

羊子山172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无墓道,墓坑口大底小,有棺、椁痕迹。椁室四周和底部用白膏泥填塞。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晚期蜀文化墓葬的特点。172号墓随葬陶器有小口圆底罐(釜)、茧形壶:铜器有容(礼)器鼎、甗、釜、甑、釜、钲、盃、匜、盘、双耳釜等,兵器有剑、戈、矛、弩机、镞等:漆(木)器有盒、奩:玉器有璧、瑗、环及剑鞘上的附件。随葬器物中除有蜀文化因素(陶小口圆底罐、铜釜、釜、盘、戈、矛)外,还有中原(铜鼎、钲、盃、剑)、秦(陶茧形壶)及楚文化(漆器、铜甗)的因素,很显然以蜀文化因素占了多数,但同时也表现出相当份量的外来文化成份,具体地说就是,这些外来的成份中多数具有礼器的性质,如铜鼎、钲、盃、甗等,但它们又不同时构成某一考古学文化的铜器“组合”,而是分属不同的文化内涵,这种状况至少体现了以下的特征:第一,晚期蜀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和有选择性的并存。对外来因素的选择,晚期蜀文化更多的是趋向于对体现了中原文化(广义上的中原文化,当还包括此时已很大程度上中原化或成为中原文化一部分的秦、楚等文化)先进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器物的偏好,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中原向心力。同时,对具有较高实用性的器物进行有限的利用。如是,在级别较高的晚期蜀文化墓葬中,往往呈现出多样的文化面貌,这恐怕是当时周围少数部族^⑥上层墓葬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以占有这种礼器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标志。第二,随着统一战争的进程,原有的战国时代形成的不同文化间交流的空间和频率、广度和深度都

是空前的,对远居西南的四川盆地带了强大的冲击,从文化认知上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帝国及随后更为强盛的汉王朝。

羊子山 172 号墓打破的是一带祭祀成份的盟誓遗存——羊子山土台,它是古蜀文明继三星堆文化后发展高峰的代表,是早期蜀文化中的一处圣地。那么,作为蜀文化墓葬的 172 号墓为何敢将坟茔置于重要如斯的圣地呢?这还得从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着手。172 号墓为秦代墓,那么土台当废弃于秦代之前,结合秦灭巴蜀的史实,其当废弃于公元前 316 年后。秦灭蜀后,为巩固其政治统治,一方面在数处战略要地驻军,包括在成都东大门龙泉山驻军,另一方面对故蜀上层的反叛进行镇压,并摧毁占领地意识形态的载体,而羊子山作为故蜀国的典祭场所,具有和宫殿、庙宇同等重要的地位,秦必毁之、废之。虽然 172 号墓是蜀墓,但这时的四川盆地早已纳入秦之版图,在秦的直接统治下已近百年,历数世,蜀国故人亦多亡去,受秦统治的蜀人后裔,恐也无法顾及许多,而径直将废弃了的土台当作死者的理想安息之地,这也并不矛盾。但这又引申出一个问题:根据出土器物判断出的墓葬文化性质和墓主人意识形态间可能存在的 inconsistency,这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思考。

(二) 大邑五龙乡 18、19 号蜀人墓的认识

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大邑县五龙乡出土的秦代墓是该区域不可多得的材料^②,对于深入认识这一地区秦代墓的特点具有相当的价值。

两座墓的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未发现葬具,墓底和四壁均涂抹青膏泥。

它们的随葬器物颇具特色和代表性:瓮(简报名为罐) 21 件,占出土陶器总数的近十分之四,形制为大口,深鼓腹,下腹内曲,平底,器物体量大。该类器物原先仅见于大邑五龙墓地,其它地点尚未见有出土者,该墓地 1982 年清理简报称在成都西校场战国早期遗址中曾发现 1 件,但未见正式报导。给人的印象好象这类大口瓮仅见于大邑墓地这一处(时代分别是战国早期、战国晚期和秦代),使人困惑,对其是否是蜀文化性质及用途不好判断。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初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2000 年发现于成都市商业街战国早期的船棺独木棺合葬墓中,出土了与上述形制相近的带盖双耳陶瓮,而且在这些双耳瓮中还发现有不少的粮食碳化颗粒和果核等。那么这种大口瓮应是晚期蜀文化用于储粮的日常器皿。到目前为止,这类大口瓮仅出现在战国和秦

代的晚期蜀文化墓葬中,尚不知其源,但这种只在某一相对较短时期内存在、具有明显时间刻度标识的陶器,在今后的工作和研究中应引起我们相当的重视。除此之外,陶豆、铜釜、釜甑、柳叶形剑、对称弓形耳矛等均为晚期蜀文化器物。相对而言,从简报公布的材料来看,19 号墓有更多的非蜀文化因素器物:如秦器陶盆、楚器陶缶(简报名 III 式罐者)、中原之长胡内刃戈、有格剑、弩机等。

大邑五龙 18 号、19 号墓集中反映了秦代蜀人墓葬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既有占主导地位的蜀墓本质,又广泛吸取了当时相关文化因子。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秦王朝对四川盆地统治的生动写照和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统一,是与当时的历史变迁和状态相符的。正是这种动态的变化趋势,使蜀文化在走过数千年历程后,迅速地融会进了华夏文明之中。这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还说明了一支考古学文化的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大可能因为以某文化为主导的政权的更迭而嘎然而无存,文化的延续性较之政权的影响要长久和绵长得多。

(三) 涪陵小田溪巴人秦代墓的相关问题

涪陵小田溪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边缘、长江支流乌江西岸一级台地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在此发现了数批(清理九座、公布八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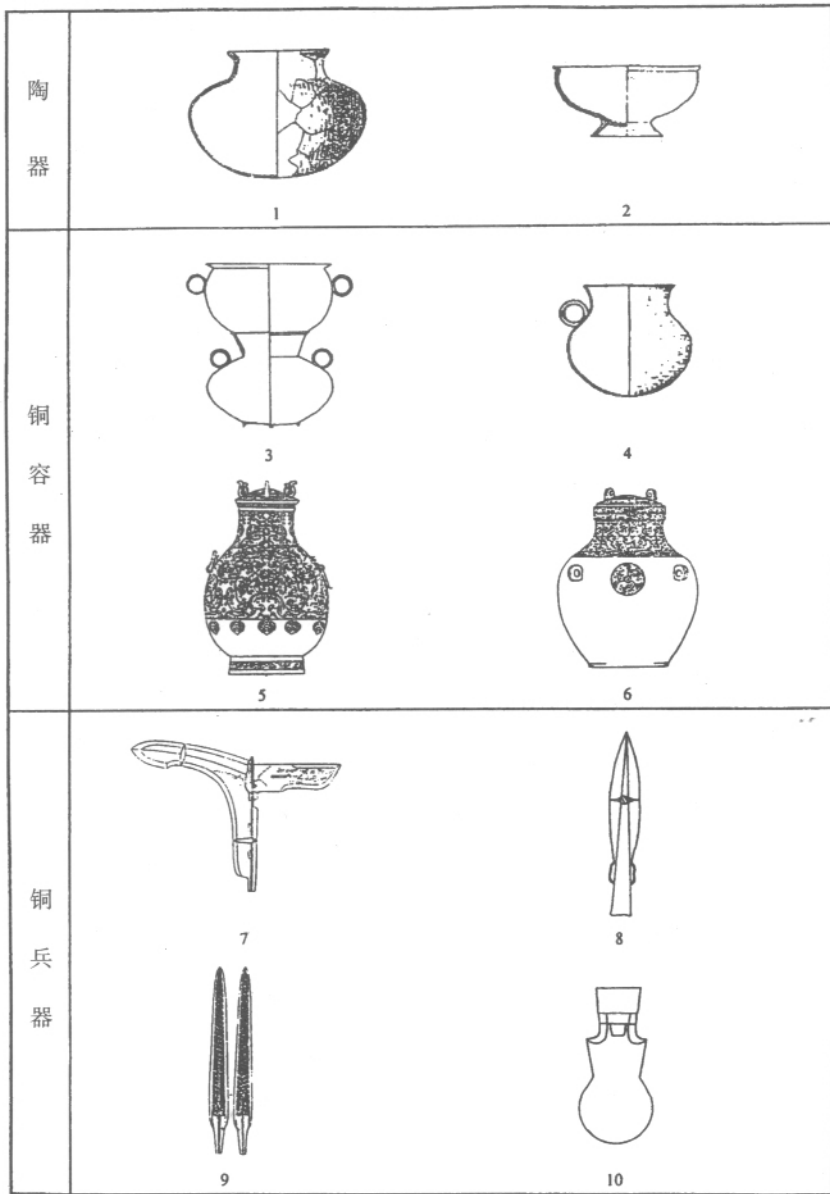
1972 年的三座墓葬(编号 1~3 号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原报告定为战国时期^③,根据宋治民先生研究定为秦代墓^④,1980 年清理 3 座小型土坑墓和 1 座残墓(编号 4~7 号墓),发掘简报将其时代定在战国时期^⑤,现将其改定为秦代^⑥。1993 年,在小田溪又清理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 9 号墓),简报将它的时代定在战国晚期^⑦,现根据葬具和铜器组合特点,将其时代定在秦代。

小田溪这三批八座秦代墓有如下的共同特点。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棺槨,有的为漆棺。葬式为仰身直肢(9 号墓)。随葬陶器有釜、豆、壶,铜器有容器釜甑、釜、壶、甗(缶)、盆,兵器有戈、矛、剑、钺、弩机,工具有刀、削、凿、锯等。这些共性或可作为这一区域判断是否秦代墓的一个参照系(图三)。它们都是巴人的墓葬。属于晚期巴蜀文化的器物有:陶釜、陶豆,铜釜甑(上甑下釜套合使用)、辨索耳铜釜、釜、柳叶形剑、圆刃折腰钺、对称弓形耳矛和无胡戈,属于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有:铜甗(M1:25。应为缶,系来自楚文化)、壶(M4:11)、错银铜壶(M3:23)、编钟、方形双龙纹铜镜、无郭弩机、铺首衔环、

漆奩(卮) 等。

八座墓体现出的等级秩序。根据随葬器物的情况, 可将它们分成两个组: 1~3号墓为第一组, 4~7号墓和9号墓为第二组。第一组墓出土遗物以青铜器为主, 不但有完备的容器、兵器组合, 还有令人瞩目的礼乐器——编钟、钲和鎛于出土, 不出青铜工具, 应为巴国贵族墓葬。第二组墓青铜器以兵器和工具为主, 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特点凸显。如果仅从随

葬陶器和青铜兵器上来看, 我们是很难区别它们的贵贱的, 而这两部分又基本上是晚期巴文化的土著因素, 但是一分析墓葬中的外来文化因素, 区别就十分明显, 这种以占有外来文化礼器(主要是中原礼器类) 作为地位与身份区别标识的做法, 在四川盆地晚期巴、蜀文化上层墓葬中是相通的(如新都马家蜀文化大墓)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原文明在向外扩展中, 首先为周围少数部族上层所认可和接受,



图三 涪陵小田溪巴人秦代墓葬器物举例

1. 陶釜(M3: 36) 2. 陶豆(M7: 1) 3. 铜釜甑(M9: 36) 4. 铜釜(M5: 10) 5. 铜壶(M3: 23) 6. 铜甗(M1: 25) 7. 铜戈(M3: 13) 8. 铜矛(M9: 1) 9. 铜剑(M9: 9) 10. 铜钺(M9: 50)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扩张方式,同时也证明了此时的中原文明是先进和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和强调秩序的中原政治体制,不但赢得饱受战乱的中原各国人民的人心,而且对于整合、形成周围少数部族对中原的向心力,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主要通过政治程序,而不是技术、贸易的发展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发展模式,跟三代以来的文明产生和演绎进程是一脉相承的,属于中国古代连续性文明^③的延续和发展。

注释:

①、⑥ 滕铭予:《汉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②、⑧、⑭ 宋治民:《略论四川的秦人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③ 栖霞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栖霞县松山乡吕家埠西周墓》,《考古》1988年第9期。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⑤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⑦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牒——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⑨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管理所:《成都龙泉驿区北干道木椁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8期。

⑩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第89页图六七之12,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⑪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第108页图八〇之2,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⑫ 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化馆、荣经县文化馆:《四川荣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荣经县文化馆:《四川荣经曾家沟21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⑬ 宋治民:《四川战国墓葬试析》,《四川文物》1990年第5期。

⑭ 荣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荣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

⑮ 李明斌:《浅析广州西汉前期墓葬中的楚文化因素》,《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⑯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第110页图八一之1,三秦出版社,1998年。

⑰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第134页图九六之4,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⑱ 主要有青铜鼎、甗、敦、壶、尊缶、浴缶等。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⑲ 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⑳ 楚曾与秦争夺西南地区。公元前279年前,楚攻取已纳入秦国版图的旧巴国的枳(今重庆涪陵)。《战国策·燕策二》载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所谓楚的“国亡”,当指楚失去都城郢而言,可知在公元前279年前,楚曾攻取枳地。

㉑、㉒、㉓、㉔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㉕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㉖、㉗ 宋治民:《略论四川战国秦墓葬的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

㉘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㉙ 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㉚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

㉛ 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地区博物馆、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涪陵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㉝ “在这些文明……产生的过程中,政治程序(而非技术、贸易程序)都是主要的动力”。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中国文明……产生过程中,意识形态作为重新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以产生文明所必需的财富之集中的一个主要工具。”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